

书城掌故藏家史 别有续编在人间

——《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整理记*

徐 雁

我国学者对古代中国藏书的历史资料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大致是以清末学者、江苏吴县人叶昌炽(字鞠裳,1847—1917年)着手他的巨著《藏书纪事诗》编集为发端的。

这部成书于一八九〇年的著作一问世,便以其资料收罗上的博大精深,成为当时和后来治中国古代典籍之学者所不可缺的案头便览;它对古代藏书家事迹的搜集和总结,更使得藏书家的文化学术史地位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展览,从而为藏书家在学林史传中博得了一席之地。尤其可贵的是,《藏书纪事诗》为学术界开辟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发达的藏书历史、丰富的藏书史料,令近代学术界不得不为之关心瞩目。于是,作为历史科学的一部分的中国藏书史的研究,由于叶昌炽的努力,从此开始了。

《藏书纪事诗》对于古代藏书研究活动的发创开先作用,近人蔡金重在其《藏书纪事诗引得》中颇多论述,略云:“是集……详述典籍之源流、阐扬藏书家之潜德,洵为不朽之作。近杨立诚之《中国藏书家考略》、陈登原之《古今典籍聚散考》及林圀之《蟫林辑传》、吴晗之《两浙藏书家史略》等,皆以《藏书纪事诗》为其滥觞;《常昭合志稿》更辟一藏书家栏,为志书收藏书家之先声。凡此胥由鞠裳之发闡,而诸藏书家得以不泯没也。”其实,《藏书纪事诗》的倡导作用尚不止此,自后学者编撰的续、补藏书纪事诗更是模仿和发展《藏书纪事诗》这种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直接成果:

“余读《藏书纪事诗》而少之,为益数十人。辑录粗就,尚待润色,例依叶书。……”(《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序》)

“读叶鞠裳(昌炽)《藏书纪事诗》,后依其体续补一百二十余首,为其晚年未定稿。”(《续补藏书纪事诗·引言》)

恰如台湾学者苏精先生所评论的那样:“国人素重典籍,但凡读书之家莫不有些藏书。因此从《藏书纪事诗》刊行后,数十年来类似的撰述踵接而出,……内容体例虽然各有所别,却都是效法叶昌炽而作的,中国历代藏书文献也因之大备。”(《近代藏书三十家》叶昌炽篇,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顾廷龙先生题签,谢灼华老师作序,为《北京大学学海丛书》之一种,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

对于同《藏书纪事诗》相“类似的撰述”，早在一九七五年以前，台湾学界的同行们即予以相当的注意。其成绩便是单行本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广东藏书纪事诗》的问世。《丛刊》本编者且述其愿望云：

“据本书序言原注，知记广东藏书故实者，尚有东莞伦明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卷，经寻访未得。我们馨香祝祷伦著有重现之一日。若天假机缘，亦归本馆出版，

与此书合璧，自是使人生平欣慰的乐事。”

此言发于一九七五年，是当日文海同人在台湾虽对《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予以搜访而终未及见者。（按：伦著虽以广东人氏故，记广东藏书家事迹为多，但未如“文海”言专“记广东藏书故实者”。）为呼应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马同俨先生校注本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我北京大学学海社以学术之公心，播秘籍之不传，将经年寻觅所得的秘本《藏书纪事诗》的续著、补著和仿作汇为一编，总其名曰：《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目前，整理工作稍稍告竣，兹将其间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近代广东藏书家伦明（字哲如，1875—1942年）撰有两种，一为《续藏书纪事诗》，据自述知其“补纪事诗数十人”。（《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叶昌炽篇）；一为《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曾披露于1935、1936年天津《正风》杂志，收集藏书家一百余人。但据郑逸梅老人介绍，是诗后因《正风》停刊而失续，只有尚有流传的稿抄本是足本。稿本尚存人世，但不知保存何处。江苏藏书家王謇（字佩诤，1888—1969年）撰有《续补藏书纪事诗》一卷，收罗藏书家一百余人、发为一百二十余篇纪事诗，仅见有油印本（刻写）流传于苏沪一带。苏州图书馆保存有几册，但也不知稿藏何方。安徽学者吴则虞（1913—1977年）也撰有一种，称《续藏书纪事诗》，分地域分别补续清及近代藏书家三百六十人、发为纪事诗二百七十篇，于我们知见的续著中卷帙最大。署为十二卷，稿本尚存。其中仅四川藏书家部分七首曾载《四川图书馆学报》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广东藏书家徐绍桀（字信符，1879—1941年）另撰有一种，题名《广东藏书纪事诗》，收录自明代而后广东地区藏书家五十余人、发为纪事诗五十四篇。此外，江西藏书家刘声木拟撰《续藏书纪事诗》一种，曾于其《直介堂丛刻目》中公布此项计划，但在一九三六年尚未见付梓，至今未见刻本流传，竟不知其成稿与否及稿藏情况。此外尚有广东藏书家莫伯骥（字天一，1878—1958年）撰有《藏书纪事诗补续》手稿一种，据说已毁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兵火中。

总之，有关《藏书纪事诗》的续著、补著和仿作，或系稿本，或系抄本，蒐集甚为不易；且据我们此次工作的体会，大概作出除上述我们所知见者之外、尚有若干种仍秘藏于人间的假设，当不会是不切实际的推想。我们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续补藏书纪事诗》既不止是我们此次校注的这四种，则我们的工作远未结束；所有续著的合璧，尚祈望于前辈的指引和同志的努力。

（一）

由于知而未见的缘故，我们这里只谈此次经手整理的四种，即：

伦明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以下简称《辛亥诗》）；

王謇撰《续补藏书纪事诗》（以下简称《续补诗》）；

徐绍桀撰《广东藏书纪事诗》（以下简称《广东诗》）；

吴则虞撰《续藏书纪事诗》（以下简称《续诗》）。

纵观上述四种著作，我们感到它们的一个共同点都继承了叶昌炽创设的纪事诗体藏书家传的体式，即“领以绝句、缀以事迹、必要时殿以按语”的著作规范。其中刻意模仿者为吴则虞的《续诗》（它还严格遵循了叶著以辑录为主的特色），而其余三种在陈述事迹时都采用了笔记体。由于传主时代的不同，这种变通应该说是合理的。

《藏书纪事诗》的续补者同叶昌炽一样，对民族文化遗产均持有一种正确的民族立场。由于社会思潮的推动、也由于藏书家自身思想的进步，二十世纪以后，传统的藏书私有、子孙世守的观念已日趋淡漠，恰如伦明言：“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今已萌兆之矣。”适应这种历史潮流，伦明、王澐等人均以私家藏书捐赠于国家各级公立图书馆为“得所归”：

万木草堂藏书：“自（康有为）身歿而后，遗书出售，归广西大学图书馆所藏，尚称得所焉。”（徐信符《广东诗》康有为篇）

铁琴铜剑楼藏书：“抗战之役，世守藏书毁于兵燹，而行篋精品尚有存者。解放后，以平直贡诸北京图书馆，得所归矣。”（王澐《续补诗》瞿熙邦篇）

《四种》在收录的对象方面同叶著在明清部分略有重复，如天一阁、阅微草堂、铁琴铜剑楼、持静斋等藏书世家，盛昱、曾钊、莫友芝、王懿荣、方功惠、李仲约等清季藏书家。但由于著者所处时代有先后之别，各自掌握的材料又各有不同，因此，将《四种》的有关篇目同原著加以对照，在史料上是必有收获的。就《四种》内各书而言，则收录上的交叉重复更多，如康有为万木草堂、梁启超饮冰室、李盛铎木犀轩等名家藏书便是。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叶氏的著作还是《四种》，其收录面同著者的居游范围大概有很大关系。且以《广东诗》为例，它列入传目的藏书家自明及近计得五十四人（其中八人有诗无传），而综观《藏书纪事诗》所录，则自宋至清尚不足十人。这大抵同《广东诗》的著者系广东人氏、比较熟悉当地文化及人物掌故有关，而叶昌炽是江苏吴县人，耳目所接不及徐氏所致。

还可注意的是，由于近代的学界宗师、文坛巨子颇多兼为藏书大家者，因此《四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近现代文化学术的稗史笔记观。因为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罗振玉、黄遵宪、柳弃疾、马隅卿、刘师培、余嘉锡、陈垣、傅增湘、郑振铎、顾颉刚等人的生平行止、学历著述以及有关的掌故逸闻，《四种》颇多录载。

假如把《四种》的纪事绝句同《藏书纪事诗》作一番孤立的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它们普遍地都缺乏形象思维和文学神采，但在纪事写实方面却不乏可观者在，一些诗句常因其切中了藏书家的心事、道出了其藏书的甘苦而为学者所乐于征引：

“四库重修愿莫伸，续编提要有何人？”

（《广东诗》伦明篇）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辛亥以来诗》傅增湘篇）

当然，还应该指出的是，《四种》的著者在才华学识上达到的高度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他们的见解记述也不是尽善尽美的，错谬讹误乃至保守落后之处也数不在少，但相信读到《四种》的同志当能以剔糟汲华、败鉴成取的正确态度有以处之。

（二）

就此次我们汇辑并整理的《四种》而言，它们的史料价值确乎是比较高的。它们的合集梓行

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叶昌炽发创的纪事诗体藏书家传有了貂尾之续,而且使近代书林学坛史迹的研究者有了一个较为丰富的、可资凭藉的资料集。兹将其史料价值之尤要者分类撮述如下:

近代藏家的传记资料 《四种》共收录了近代及那些历明、清两代至近世尚存的藏书楼三百余种次,虽还不是近代私家藏书史的全貌,但去其复重可得二百余个私人藏书家的事实,证之其它有关史籍,可知近代私家藏书的概貌已经约略具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记述中,著者均尽量明其籍贯、详其字号、述其室阁、考其生平、集其事迹、存其著述,因此借之足以了解一藏书家的基本素材,可以这样说,现代意义上的“专科传记辞典”的重要要素,《四种》基本上都包容了。

藏书史实的记录辨正 《四种》收录的藏书家的活动时代距著者往往较近,因此多有以传闻入载者。既谓传闻,则误植失实者亦自难免。而依据《四种》之间的互核互证,有时便能澄清有关的史实。如关于清人丁日昌可曾掠夺民家藏书,为近世藏书史一大公案,对此,《辛亥诗》、《续补诗》、《广东诗》皆有争辩。而通过比较诸说,是非曲直便显而易见了:

“江南乱后,故家书尽出,中丞(丁日昌)留意收拾,遂成巨观。相传有豪夺之事,盖陆存斋诬之。存斋据郁氏宜稼堂书,及自闽归,其精槧已为中丞所得,大嗾之,因造无稽之言。蒋香生、俞荫甫俱有辨,不赘述。”(《辛亥诗》丁日昌篇)据此,则公案易断而是非分明了。

私家藏书的聚散终结 《四种》均不同程度上述及私家藏书的聚散史实,可借以考知诸私家藏书之间的传承关系,同时也是考察旧时代私家藏书聚散同社会之关系的可宝贵的资料:

林石庐……多藏金石书,大都为缪艺风故物,以三千金得之于缪氏后人。”(《续补诗》)

“陆颂尧(鸣冈)世居上海,专收郭天锡而下,尽明清辛亥之私家‘起居注’、‘在日记’一类……富邸曾遇祝融,……人谓‘书神’无灵,实则陋规积习:救火警士未遂所欲则坐视不救。已允总稿五千全矣,而中夜无从支付现钞,遂使名家稿钞、校本、日记真迹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矣。可胜浩叹!”(《续补诗》)

重要典籍的流传存毁 《四种》保存了大量的重要典籍(秘本、孤本、善本等)流传存毁的情况,其中既有珍贵的宋槧元版,也有罕秘的近人稿抄校本。由于其中诸书成书略分先后,因此对其记载作一番细致的扒梳工作,则一些重要典籍的流传线索、存佚状况将是一目了然的:

“顺德李仲约侍郎(义田),……其未刊稿以《元史地名考》最巨,而家藏本缺佚将半。余所见,柯凤孙家有一册,东方图书馆有一册,闻上海某家亦有一册:合之可成完书。”(《辛亥诗》)

“湘潭袁伯夔(思亮)……曾得持静斋藏世采堂刻《韩昌黎集》、世称‘宋本集部第一’者,竟毁于火。”(同上)

近代藏书风气的变迁 《四种》的记述为我们研究近代藏书的风气衍变提供了大量依据。我国古代藏书基本上是以前代版本的搜集、珍藏和鉴赏、利用为主要特征的,到了近代则藏书家的兴趣普遍地有了改变,多表现为悉心收集、建立“专藏”,为学术研究服务。如山经地志,百工技艺、俗文曲部、邸抄闺卷、谱牒笔记等以前不为藏书家所重的子、史、集部僻书,在近代则多有藏书家专门搜集入藏。溯源考流,当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潮的东渐有关:

姚方羊……藏吴中人物志为多,均不经见之小方志,人皆重之。”(《辛亥诗》)

“绍兴王绶珊,余未识其人。有杜国盛者……略言其有……方志二千八百一部,

全国未收得者止十分一。”(《辛亥诗》)

近代书业的活动实录 叶昌炽在总结古代藏书家活动事实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劳动阶级对古代文化事业的贡献，因此《藏书纪事诗》之另一最堪称道处，便是他在家刻本中附辑了书业工匠的劳绩。《四种》的著者多继承了这一特点，从中大抵可见书贾在古代藏书聚散、古籍流通过程里的功过是非，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近代书业活动的重要资料。如本传中录存了不少琉璃厂书贾的事迹，其中就有“厂肆书业称三王，神妙犹推玉藻堂”的玉藻堂书肆主人王雨，有“书目谁云出郎亭，书坊老辈自编成”的通字斋主人孙耀卿，也有“五载春明熟老谭，偶谈录略亦能谙”的正文斋主人谭笃生等。

近代书院的藏书事实 有关我国古代书院藏书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并不很多，学者班书阁先生早年撰写的《书院藏书考》于封建时代书院藏书言之綦详，洵为权威之作。下及近世，著名学人多主书院讲席，而以书院藏书以裨学问为一时风气。《四种》于此多所记述的有《广东诗》。据原刊“编者按”称：

“……其中所述广雅书局十峰轩、广雅书院冠冕楼、菊坡精舍书藏、惠州丰湖书藏之史实，均为广东文化教育重要史料，尤足珍贵。”(《广州大学学报》一九四九年复刊号)

实际上，它们更是撰《中国近代书院藏书考》者所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

此外如述地方藏书的兴衰隆替、藏书家的目录版本言论等，都有丰富的史料可寻。

(三)

受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我们此次的整理主要在于搜集版本、校点成文和辅助索引，无疑工作是很不充分的。

但是，就是在这么一点工作中，前辈钱亚新先生屡以教赐，顾廷龙先生挥毫题签，谢灼华老师欣然为序，更有苏州大学潘树广老师的热情指点，北京大学学海社诸学友的尽心帮助，又承蒙同窗谭华军学兄暇中为此编制了科学的完整索引：这使我深受感动。专志于此，以抒谢忱。

“书城掌故藏家史，别有续篇在人间。”我深知这一工作远未结束，因此足本《续补藏书纪事诗》的问世，尚深深冀属于学界前辈的指踪引渡和同志间的通力合作！